

· 清水江学研究 ·

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民间移民的生存策略

李 斌, 吴才茂

(凯里学院民族研究院, 贵州 凯里 556011)

摘 要:清水江流域在明清时期,是一个容纳军事移民和民间移民的重要区域。不管是军事移民还是民间移民,移居到清水江地区以后,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这样一个“一线之外皆苗夷”的地域空间里面生存下来,是这些移动人群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历史与民间文献的梳理可知,当他们进入清水江流域之后,利用了改姓、变换身份等生存策略,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聚居区,这对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清水江流域;移民;少数民族;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329(2021)05-0031-07

移民问题,历朝历代均不乏其例,不管是军事移民还是民间自发的人群移动,每个时代均有发生。宋元以降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更是移民史上的最著名的移民案例。特别是明清时期,人口稠密地区的人口向西南山地移动,使山地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清水江流域自明代以来就是一个容纳军事移民与民间移民的重要地域。对于这一地域的移民问题,纵论性的研究,已有曹树基《中国移民史》那样的经典之作。^[1-2]新近吴才茂以卫选簿讨论卫军籍贯与贵州人口结构变动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亦颇多启发。^[3]当然,也有专论清水江流域军户、民户者。^[4-5]至于论及人群关系以及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张应强对“弃龙就姜”的敏锐观察,也为我们提供了微观的视角^[6]。众所周知,清水江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核心区之一,人群之间的移动,特别是外来人口,与当地少数民族人群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这种因人群移动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聚居形态,对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移民与土著之关系

移民与土著,两者并不是固定不变以及界限非常清晰的人群,因为从广义上来说,一个地区内绝大多数居民其实都是外来移民,只是迁移进入的时间有先后而已。

就清水江流域居住的人群而言,据史籍记载,苗族的祖先是蚩尤,^①在与炎黄联盟发生的涿鹿

收稿日期:2021-08-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以降清水江流域碑刻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7BZS005)

作者简介:李斌,男,博士,凯里学院民族研究院教授,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才茂,男,博士,凯里学院民族研究院教授,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只有雷山西江苗族支系称自己是蚩尤的后代,其他尚未见到。最早的记载是在1942年,雷山西江文化人侯昌德与鼓藏头等修订《西江苗族父子连名族谱》,记述了从蚩尤到雍正十年(1732)改土归流时285代父子连名的谱系。改土归流后,受附近屯堡汉姓影响,不同的家族改成了唐、侯、杨、蒋、李、董、宋、梁、毛等姓氏。西江苗族认为自己是蚩尤第68代孙虎飞率部从雷公坪逐猎犬来到西江的。

大战中兵败被杀,其后九黎部落纷纷逃离中原,或东迁,或南移,或西进,由此开始了苗族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春秋战国时期,连年战火迫使苗族迁入武陵山区。西汉初年,苗裔溯沅江而上,进入“五溪”地区。“五溪”之一的就是舞水,即舞阳河,流经黔东南的黄平、施秉、镇远、岑巩,今天黔东南的苗族相当部分就是沿江而上迁入的,舞水在湖南与清水江汇合后就称沅江,而沅江的主源就是清水江。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进入武陵地区的“武陵蛮”被迫向西、向南迁徙,分三路进入贵州,一部沿舞水、清水江而上,从湖南西南部进入黔东南;一部经湖南西北部进入黔东;一部溯渠水、巫水而上,经湖南南部进入广西入贵州^[7-8]。可见,所谓当地少数民族,只不过是迁入的年代更为久远。

至于清水江流域另一个人口较多的侗族,也是一个不断移动的民族。关于其族源,学术界一致认为是由古代百越族群发展而来的一支。在漫长的历史社会变迁中,由于种种原因,“这支越人迁到岭南,落于两粤交界,与骆越杂处”^[9]。后循着都柳江而上,散居于今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的毗邻之处。这种说法与侗族古歌《祖公上河》《祖公落寨》所述内容相吻合。至宋代,侗族以单一的民族称谓出现在汉文文献中,如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辰、元、靖州地有仡伶、仡览、仡佬、瑶……”这条记录中的“仡伶、仡览”分别是侗族自称“更”(gaeml)、“干”(gaml)的反切音译。元明时期,侗族又被称为“峒蛮”“峒人”,对于这样的称谓,可能是由于侗族多生活在溪峒地区有关,从而使“侗族由一个地理名词、基层的行政名词渐渐转化为百越族群分化出来的民族共同体的族称,即专指‘峒人’”^[10]。

这些宋元以前进入清水江流域的人群,在地化之后,逐渐成为世居民族。而明代进入清水江流域的屯军与移民,在社会历史变迁中,也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也变成“土著”。如黎平府“屯所之户,明初军籍十居其三,外来客居其七,今日皆成土著”。“自改卫(指五开卫)为县(指开泰县)时,军屯皆成土著,身住屯所,业落苗寨。视彼邻省邻府客民,跋涉相依,尤为便捷”^[11]。这种插花式的居住形态,进一步加大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说,外来移民与“土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极为频繁的。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姓氏的使用了。

清水江流域各县的姓氏众多,据统计,2005年天柱县有207个姓,实际只有194个,另有13个姓氏无人统计^①。2005年黎平县有301个姓氏。其姓氏来源有二:一是外来人口迁移与繁衍;二是由土著土语称谓中衍生而来的。如黎平县岩洞镇竹坪村有21个姓氏,有内、外姓之分,内姓15个,外姓6个,是清末民初迁入的。内姓是每个房族都有其侗语姓氏名称,为本土土语称谓衍生,后来演变为汉字姓氏。内姓的由来,一是由一个房族聚居地的侗语名称而定;二是根据其来历而定,如聚居在冲里的房族,侗语称“郡公井”,“郡”是一个房族或一群人之意,“公”即一位公公的世系,“井”即是山冲。“郡公井”是居住在山冲里的公公世系,后来以汉字谐音演变为姓“龚”。又如侗语称“宁郡顿”,意为“聚居于山湾里的人群”,即全寨祖先开拓的地点,比喻为一株大树的根,侗语称“顿”,以汉字谐音演变为姓“邓”^[12]。这也是笔者第一次看到有关“土著”姓氏的由来。

二、祖宗之变:改姓与“赐姓”

迁入清水江流域的不同姓氏,在社会变迁中,逐渐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宗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常常根据居住环境、政治形势、社会情状,为了获取更加便利的生存条件,往往以改姓策略最为常见。兹举数例,略作说明如下。

凯里顾氏改姓。《贵州凯里顾氏族谱凯棠支谱》记载了顾氏改为唐、周、王的过程,其因据称有二:一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在清嘉庆年间,顾良相之子雄邦公(入凯棠始祖)第七世孙、居住在凯棠的麻令(66世)和丢所(66世)两堂兄弟要参加科举考试。他俩在报名时,发现已报考的人中顾姓人较多,为增加录取的机会,麻令将自己的学名改为“唐成举”,丢所也将自己的学名改为“周

^①杨德润主编:《天柱县民族·姓氏·村镇·文物集成》,天柱县文体广电局内部印刷本,2006年,第65-66页。

在瑚”。最后,两人均考取秀才。唐成举考取秀才后,居住在凯棠养小寨的顾姓都跟着改为唐姓,并订立“世玉永远、正家兴开、文再自从、将德举后、来定乾坤”20个字的字辈。与此同时,周在瑚在考取秀才后,居住在凯棠甘稿寨的九金后裔也跟着改为周姓,其居住的地方也称之为“周家寨”。“周家寨的周姓恢复为顾姓的年代大约是1940年左右,周家寨又恢复为甘稿寨,也是周姓变更为顾姓的开始。”^①二是为了生命安全。凯棠龙塘村的苗民岩大五,本名顾馥春,苗名耶九,充当哥老会的首领。1853年参加保乐、九松起义,1855年再次参加张秀眉起义,后于1871年兵败被杀。1873年,清军对岩大五家乡的顾姓族人进行清查,为避免被杀戮,鼎雄公后裔被清军王姓军官招安,跟随其姓王。于是,原居住在龙塘的顾鼎雄公后裔(除少数居住在边远偏僻的人家,如现在南江别道寨的顾永明一房外)包括移居新寨、南江及黄平党遥等的族人都改为王姓,至今已130多年的历史。^②这样,鼎雄公后裔的绝大多数就改为王姓了,但王姓人一直认为他们自己是顾家人,而顾家也一直承认他们是自己家族的兄弟。据《贵州凯里顾氏族谱·凯棠支谱》之《职称职务人员简历》记载:鼎雄分支共记录并介绍了109人,其中王姓占绝大多数,有92人之多,顾姓16人,另有一张姓(王姓之妻),包括一名担任省部级干部的王姓族人;夏雄分支共记录并介绍了56人,其中顾姓37人、唐姓17人、另有2姓(顾姓之妻)。顾氏71世、鼎雄公第11世孙王维宁,苗名碾保,原名王光吉,又名顾维君,曾对凯棠顾、王氏宗族简谱作过考证说明。^③

锦屏“弃龙就姜”。清水江下游文斗地区有许多对龙姓“弃龙就姜”描述:文斗上寨《姜氏族谱》述及其太高祖姜春黎迁入文斗时,“虽同姓者认为门,然犹疑为外来客家,恐其恃智相欺,遂与龙姓暗商,将中寨之地,让与吾祖先居住,万一不顺,好同下手。”题名为《万载流芳》的族谱收存了原为龙姓后裔的人群,现已是文斗下寨姜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谱记载了“初进文斗住坐”之“一代祖”龙朝玺,到“七代祖弃龙就姜”,以及其后以姜姓繁衍发展的过程。“弃龙就姜”“是因文伯、文举两太公弟兄赴考,几次未中,后改姓姜,两弟兄中一文一武,故弃龙。”^[6]这样,自文伯、文举开始,整个家族都由龙姓改为姜姓。

文斗除了“弃龙就姜”外,似乎还存在“弃李就姜”的事例,如下两件契约可资说明。

契约1^{[13]249}:立卖山场杉木字人本房李绍瓚父子四人,为因缺少粮食,自将到杉山共貳处,一处穷诸了,上凭盘路,下凭冲口,左凭山水沟,右凭油山;又一处土名从陋贯,上凭油山盘至冲,与绍宏杉山为界,左凭钟英油山冲,右凭冲。今出卖与本房姜绍齐名下承买为业。面议谷一百九十斤,亲手收回。其山杉木自卖之后,任凭买主修理管业,卖主父子不得异言。恐后无凭,立此卖字存照。内涂二字,添四字。

道光八年二月十三日

契约2^{[13]414}:立卖载手杉木字人下房李如兰、如连、如葵弟兄三人,为因要银用度,无处得出,自愿将到先年佃栽熙华、熙和之山,土名冉歪一块,其山界至:上凭钟英,下凭大路,左凭恩诏与冲为界,右凭钟英,四至分明,今请中出卖与本房姜绍熊叔名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议定价纹银贰钱五分,亲手收足。其山自卖之后,任凭买主蓄禁管业,卖主弟兄不得异言。恐后无凭,立此卖载手杉木字为据。

外批:此山分为五股,地主占三股,载手占貳股。

凭中:世贤

道光廿九年三月廿六日 如葵亲笔立

①《顾改周、唐姓考》,参见贵州凯里顾氏族谱编修委员会:《贵州凯里顾氏族谱》卷三《凯棠支谱》,内部印刷本,2012年,第1-3页。

②《顾改王姓考》,参见贵州凯里顾氏族谱编修委员会:《贵州凯里顾氏族谱》卷三《凯棠支谱》,内部印刷本,2012年,第4-6页。

③ 参见贵州凯里顾氏族谱编修委员会:《贵州凯里顾氏族谱》卷三《凯棠支谱》,2012年内部印刷本,第747-777页。

在契约1中,卖主李绍璜父子称买主姜绍齐为“本房”,而契约2中,卖主李如兰兄弟三人也称买主姜绍熊为“本房”。据文斗契约文书分析,依附姜姓的李姓有两家,即李绍璜、老虎、老生、老岩父子四人和李开弟、如兰、如莲、如葵父子四人,在道光年间还有八份契约涉及称姜氏为“本房”或“叔”,具体是:《李如兰卖山契》(道光十八年)^{[13]344}、《李如葵卖木契》(道光十八年)^{[13]347}、《李开弟、如兰、如莲父子卖木契》(道光十九年)^{[13]349}、《李如莲卖木契》(道光二十年)^{[13]358}、《李如兰佃契》(道光二十年)^{[13]359}、《李绍黄父子卖木契》(道光二十一年)^{[13]361}、《李绍璜父子等卖木契》(道光二十一年)^{[13]362}、《李绍黄父子卖山契》(道光二十四年)^{[13]395}。可见李姓加入了姜姓房族,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小姓改大姓、依附大姓之现象。

在锦屏县魁胆村,当地普遍流行的说法是,王姓有四支房族,其中第四支房族从前也不姓王,其先辈是从外地来的部分小姓,为了在魁胆寨居住下去就依附于第二支王姓房族,全部被迫改为王姓。改姓的事还会将第三支房族和平翁(魁胆的邻村,原本为隶属魁胆款组织的子寨)的龙姓联系起来,说他们从前同属于一个龙氏宗族,至今双方族人见面还是以兄弟、叔伯相称,彼此不结婚亲。另据龙氏族回忆说:“那时,本寨几乎所有的人都姓王了,就是说要想在本地生活下去就必须改姓王,由于形势所迫,我们只能改姓王了。”^[14]

在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有龙、滚、杨、范、龚、耿、宋、万、胡、彭等10姓。由于“滚”姓家族势力较大,因此由外迁来的一些小姓也改称“滚”姓,但在内部是有区别,也可以互相通婚。据瑶白寨老说:早先各个姓氏来自不同省份和地区,他们当年在迁入瑶白的时候把各自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也带来了。龙家最早到寨中择地定居,滚家是从上边搬迁来的,住在上寨,杨家顺着溪流往上走,在下寨定居。范家、龚家等陆续从各地迁来。滚姓势力大,其他小姓或后来者为求得庇护和居住权,不得不改从滚姓。但改姓者有始终保持自己原来的姓氏,形成姓氏双重化。最常见的是将神龛牌位和墓碑做成双层,外层写滚姓,在里层写原姓。逢年过节或祭祖,这些改姓的人家就将本族的历史、姓氏和为何改姓等情况摆给后辈听,叫他们莫忘根本。后来,这种活动公开化,就演变成一年一度的摆古节^[15]。《瑶白摆古歌》也证实了瑶白改姓一事,歌中唱道:“说到瑶白村,十姓为一姓,十个家族为一族,全是主人无亲戚。”^[16]

锦屏县平略镇甘乌村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自明洪武初年,湖南邵阳范氏兄弟到清水江一带居住,康熙末年迁往甘乌,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清朝初期,范氏已发展到200余户,均姓范,这在锦屏实属罕见。民国初年,有几户外姓人家落户甘乌村,自觉将其姓氏改为范姓。^①

另外一个重要的汉苗之间的融合,体现在“赐姓”上。清水江流域,特别是雍正朝才开辟设置的“新疆六厅”之地,属“化外生苗地”,据称仅有氏族和部落称谓,并无汉族姓氏。部落称谓有“方”“黎”“噶闹”等,氏族称谓有“柳”(Liong x)、 “勾”(Gongd)、 “勒”(Dlees)、 “向”(Hxangt)等,这些部落和氏族称谓相当于汉族的姓氏,被称为苗姓,苗语称“寨方”(Zad Fangs,意为“方家”)、“寨黎”(Zad dlib,意为“黎家”)、“寨向”(Zad Hxangt,意为“向家”)、“寨勾”(Zad Gongd,意为“勾家”)、“客柳”(Zad liux,意为“柳家”)等。苗名则采用“子父连名”制,以二代、三代连名为主,四代连名较少。连名原则是子名在前,父名在后,祖父名排第三。如“奖杉”(Jangx Dlas),“奖”为子名,“杉”为父名;“虾奈里”(Xab Naii Lix),“虾”为子名,“奈”为父名,“里”为祖父名,等等。

这些无姓氏的人群,在与外来移民交往交流交融后,也逐渐使用汉姓,特别是雍正初年,鄂尔泰在镇压广顺一带少数民族后,呈报经理苗疆十一事,其中有曰:“苗人多同名”,应“各照祖先造册”;凡“不知本姓者,官为立姓”^[17]。清雍正六年(1728年),朝廷决定开辟苗疆,镇远知府方显奉诏至台拱诸寨招抚苗民,登记户口,赐苗族汉姓,编设保甲^[18]。官方及经办人造户口册时,登记姓氏主要采用的原则有:一是以苗族氏族和部落称谓或人名音译等为姓,如“方”即方姓,“黎”取谐

①平略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平略镇志》,内部印刷本,2011年,第53页。

音为李姓,“柳”即刘姓。如人名为“里”,即写成李姓,名为“旦”即唐姓。二是相互认姓或个人自己选用汉姓的,某人某寨先用汉姓之后,其家族或同寨同宗分出的寨子或个人均用同姓。如三穗大塆坡矮子寨邵家与良上上寨万家,源于“党”氏族,共祖先和清明会田,在编制户口时,户主登记,一个音译“邵”姓,一个自报“万”姓。^[19]

这些少数民族使用汉姓之初,只用于与官方或与汉民交往的场合,而在本民族内仍用苗名。于是,便出现了苗名上冠以汉姓,如“王略阳”,“王”为姓、“略阳”为苗名,“略”为子,“阳”为父;“张秀眉”,“张”为汉姓、“秀眉”为苗名;“任九虾白”,“任”为汉姓,“九虾白”为苗名。开设学校之后,苗民子弟入学读书,便仿造汉人制定字辈,少数宗族还仿造汉族修家谱,建宗祠^[20]。

三、民族身份之变换

在清水江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同移民群体进入之后,都有一个在地化的过程,民族身份变换是常有之事,主要存在三种形式:一是汉族变少数民族,二是少数民族变汉族,三是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变换(如苗变侗、土家族变苗等),具体情形如下。

(一)汉族变少数民族。随着移民、迁徙的频繁发生,自从始祖迁入当地后,为了生存,与当地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互通婚姻,语言、生活习惯日益本地化,也就自然融合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在人数上居于少数,为了适应当地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相互通婚等,经过一两代、三四代或更长的时间便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了。”^[21]自明代以来,中央政府通过卫所形式大规模在少数民族地区屯军,汉族也大规模进入贵州。一些军户流入苗疆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形成“汉父夷母”或“夷父汉母”,逐渐被少数民族同化。“屯所之户,明初军籍十居其三,外来客民十居其七,今日皆成土著。”^[11]如杨姓,是中国的大姓,也是黔东南等地的大姓,在天柱县约占总人口的1/4,超过10万人。^①黔东南杨姓的来源有三支,最多的是杨再思支。据《杨再思氏族通志》记载:“从二世起,随官任职,散居十地,子孙开始与土蕃侗族苗族联姻融合。”“自外迁后,多与民族聚居,部分子孙聚族而居”。有迁入剑河、台江、凯里等地的杨氏族人,“久习成俗,有用苗族子父连名取名的。散居于湘、黔、川、渝、滇、桂等。”^②另据社会调查显示,锦屏隆里所之汉民,因战乱而外逃,这些外逃者很多都籍于相邻县的侗族村寨,成为少数民族群体。例如锦屏县地稠村的胡姓有30余户,其先祖系咸丰年间自隆里所逃逸迁去,已变为侗族;而逃逸迁去榕江的胡姓、江姓的子孙亦均变为侗族。据《莲花山集》载,董氏三谟已绝嗣,隆里所已无董氏相延。^③但榕江县尚有其迁去之后裔,并已为侗族,现仍回隆里祭扫董氏。从隆里所迁至以上地区的各姓氏子孙都变成了侗族,除地稠村的胡氏外,皆说侗语、着侗装、行侗族之风习。但他们仍认定与隆里所的本家是同宗,这些地区胡姓、江姓的侗族长期与隆里村的宗族之间相互参与婚丧等红白喜事活动,并一起于清明节祭祖扫墓^[22]。

实际上,汉民在清水江流域变苗事例并不仅存于是民间文献和社会调查中,在清代宦黔官员的记述中,也颇为多见,如徐家幹就记述清水江中游一带说:“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称熟苗多半此类”,“其有天地君亲师位者,则皆汉民变苗民之属”^[23]。这都说明了外来移民有一个在地化的过程。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识别过程中,由汉族改为苗族的,主要是锦屏县龙池、地步、华寨、亮司、平江、九南等地龙姓958户4532人,映寨、寨稿等地吴姓271户1330人,丹寨县高峰110多户600多人。由汉族改为土家族的,主要是岑巩县羊桥、镇远县尚寨2000多户12000多人^[24]。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地区从1994年到1997年,由汉族改为少数民族的总人数达到45632人^[24]。

①参见杨德润主编:《天柱县民族·姓氏·村镇·文物集成》,2006年天柱县文体广电局内部印刷本,第30页。

②杨光汉主编:《凯里旁海杨氏族史》,2006年内部印刷本,第31页。

③参见(清)陈文政:《莲花山集·序》,乾隆乙亥年刻本。

(二)少数民族变汉族。清水江流域的移民除有苗化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在不断地追溯其华夏祖先的努力,以有别于“苗蛮”。锦屏县亮司龙氏土司其先祖龙政忠在明洪武初年被封为长官司后,其子孙一直世袭。龙氏族属何时开始甚至是否一直称汉族,无法考证。但最迟在雍正年间已称汉族,其后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据锦屏《亮司龙姓恢复苗族纪念碑序》记载:“1735年7月,我地苗族上层正长官司龙绍俭经雍正皇帝特许,准予入学。在此以前我地少数民族是不准考科举的——根据记载,当时是‘以夷制夷’的政策,我地苗族被迫逐渐汉化,以至延续到目前。”1986年1月,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恢复亮司龙姓苗族成份。^①2月24日,亮司龙姓恢复苗族身份,并隆重召开庆祝大会。3月,龙池龙姓和培寨潘姓也先后举行集会,庆祝恢复为苗族。^②

(三)不同少数民族间的变换。在清水江流域,除苗化、汉化外,也有少数民族之间被同化的现象。如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瑶白旧称“苗泊”,侗语叫“miul beeh”,意为苗族人居住的地方。最早在瑶白居住的是苗族人,明中期迁徙至此,侗族、汉族晚于苗族人,从而形成苗侗汉杂居的现象,由于苗族人发展慢,汉族人也不多,而侗族人发展快,加之附近村寨都是侗寨,遂逐渐被侗族所同化,最后也被侗族村寨所接纳,成为著名的九寨之一^[15]。实际上,到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身份变换也还存在,如民族识别过程中,黎平县顺化瑶族乡120多户670多人由布依族改为苗族^[24]。

四、结语

明清以来的清水江地区,是一个外来人口集聚的地区。这些通过不同途径进入清水江流域的移民,面临着一系列生存问题。除去获取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外,如何处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他们需要长期思考和践行的核心问题。换言之,他们要如何获取“入住权”,需要长期与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竞争与合作。在这种过程中,各种生存策略层出不穷,竞争性争斗甚至清代所谓“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的少数民族变乱,均与之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但除去这种极端的对抗性竞争外,在缓慢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还是交往、交流、交融占据了主流。通过历史文献与民间文献的梳理可知,当外来移民到达清水江流域之后,除去屯军能迅速占据土地之外,其余人群,或以商道从事贸易活动,或以租客身份,租山栽杉,进行经济生产活动。他们或以捐资“入籍”的方式,成为“当地人”,或以雇佣而得来之钱财,逐渐买地,定居下来。然后,再通过改姓、赐姓、变换身份等形式,获取与当地人群一样的权力,真正成为清水江流域的“主人”之一,与少数民族一道,共同造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民族聚居区。

参考文献:

- [1]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13-316.
- [2]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52-164.
- [3] 吴才茂. 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158-210.
- [4] 吕善长. 明代清水江流域的军户人口研究[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2).
- [5] 吕善长,林芊. 明代清水江流域的民户人口研究[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 [6] 张应强. 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28-229.
- [7] 石朝江. 世界苗族迁徙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50.
- [8] 石朝江. 中国苗学[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46-47.
- [9] 罗延华,王胜先. 侗族历史文化习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16.
- [10] 邓文敏,吴浩. 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①参见《亮司龙姓恢复苗族纪念碑序》(1985年),碑立于锦屏县敦寨镇亮司龙氏宗祠内。

^②锦屏县敦寨镇人民政府编:《敦寨镇志》,2011年内部印刷本,第28页。

- [11]罗绕典. 黔南职方纪略·卷六·黎平府[M]//杜文铎,等点校. 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22.
- [12]黎平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黎平县志(1985-2005)·附录·黎平县部分姓氏谱牒研究资料辑录[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307.
- [13]陈金全,杜万华. 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4]张银锋,张应强. 姓氏符号、家谱与宗族的建构逻辑——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6):36-42.
- [15]傅安辉,吴育瑞,杨子奇. 瑶白村——在融合中演进[J]. 凯里学院学报,2011(4):189-190.
- [16]杨秀廷. 瑶白听古[J]. 理论与当代,2013(5):50.
- [17]刘显世,等. 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四[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9册. 成都:巴蜀书社,2006:223.
- [18]台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台江县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92,32.
- [19]三穗县志编纂委员会. 三穗县志[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113.
- [20]《苗族简史》编写组. 苗族简史[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325.
- [21]谷苞. 在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M]//费孝通. 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77.
- [22]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仡佬族、屯堡人卷[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343.
- [23]徐家幹. 苗疆闻见录[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9册. 成都:巴蜀书社,2006:602-603.
- [24]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的恢复和更改[M]//中共黔东南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黔东南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黔东南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党的民族政策在黔东南的实践.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212.

[责任编辑:毛家贵]

Living Strategy of Immigrants in the Basin of Qingshuijiang River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 Bin, WU Cai-m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Ethnics,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11,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great amounts of immigrants in military and folk in the basin of Qingshuijiang river in Qing and Ming dynasties. No matter what types of immigrants were, they would face the situation to get along with the local ethnic people. How to live in the area fulling of ethnic groups seemed to be the emergent problems which needed to be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in history and folk, the current paper found that the immigrants integrated them into the ethnic groups after immigrating into the basin of Qingshuijiang river by such strategies as changing their surnames or identities and formed an inseparable living area with multi-ethnics, which ha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up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basin of Qingshuijiang river; immigrants; ethnic; ethnic relationship